

第一章 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新闻交流

各种迹象表明，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期。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有限资源时代，有人视之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奏，也有人将其称作通讯时代、后工业化社会或信息时代。几乎全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行当都感受到了身边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无论人们如何称呼它，我们都在沿着一个方向迈进，而在这条道路的另一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化正等待着我们。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将像发生在隔壁一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影响冲击人类的生活。

——众议员乔治·布朗 (George E. Brown)
(民主党 加州)

国外新闻故事和图片可谓形形色色，有时也许只是日报刊登的美联社发出的一条短讯，有时则可能是一幅

颇具戏剧性的新闻图片，比如说，教皇保罗二世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而地点却偏偏选在了古巴首都哈瓦那。

现代社会里最具历史意义的一幅图片也许是阿波罗十一号在登月途中拍下的。当时，宇航员们在月球上拍下了地球升起时的情景。那就是我们的星球，如同一块巨大的、被云雾笼罩的蓝色的玛瑙。这幅被广为印制的图片生动地展现了地球的脆弱以及地球在宇宙中的渺小。

地球的这一令人瞩目的形象恰好附和了人们多年来对于生态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关注。由此，人们也更容易明白为什么早就有科学家将这块被云雾笼罩的蓝色玛瑙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其中任何地方的变化也终将影响到其它地区。

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尽管有的专家对此并不认同，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趋势却是，世界正变得更像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村落。当今世界正面临诸多紧迫而棘手的问题，而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如人口膨胀、贫困、饥荒、自然资源枯竭（特别是能源的枯竭）、生物圈污染、地区政治纠纷、包括核威胁在内的持续的军备竞赛，以及因经济一体化而不断扩大的富国与穷国间的差距等，彼此间又都是相互关联的。

在这个飞速前进的世界里，惟一可以肯定的似乎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冷战这场东西方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危机还没结束多久，世界却又不得不陷入海

湾战争及其它一系列因民族主义、种族及宗教问题而引起的地区武装冲突之中。

对于这些国际事件的报道可谓一直是此消彼长，不过就影响范围而言，它们却都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这些危机的缓和，因为还远远谈不上解决，需要各国进行善意的合作。为此首先需要获得有关的信息，以便对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解，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实际上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性是分不开的。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诸如国际货币危机、大气与海洋污染、人口膨胀、恐怖主义、地区战争，以及不断蔓延的饥荒与食品短缺等问题，特别是不少领导人因为受到民族主义及地区保护主义的蒙蔽，而对国际问题态度狭隘、缺乏远见。

没有哪件事能比 1986 年 4 月发生在基辅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更好地揭示我们所处的这一两难境地。当时，核辐射剂量先后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东欧及西欧的部分地区大幅升高，污染了大批庄稼和奶制品。住在俄罗斯以外的受污染地区的居民要求苏联政府公开事实真相，而当苏联政府先是试图将这次事故大事化小，而后又拒不透露辐射造成的污染的准确程度与范围时，人们终于被激怒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从其影响范围上说确实是一场国际性的灾难，对于身处其境的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掌握可靠的信息，即新闻。

作为一位研究全球需求的权威人士，莱斯特·布朗

(Lester Brown) 把 20 世纪末的种种问题描述为“在其规模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前的各种灾难，包括饥荒、洪水、地震及火山爆发等还只是地区性的，而且延续时间并不长。但是现在，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却往往需要几个国家，甚至是全球的合作才能解决，而在这些国家间起着协调作用的机构又通常不具备国际性。技术创新除了会制造新的问题外，似乎还不能唤起人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的雄心壮志，因此在莱斯特·布朗看来，世界局势在未来几年中有恶化的趋势。

布朗对于世界问题的看法，尽管得到众多人士的支持，但仍不能为这些国家里的大多数人所理解。就拿美国人来说，由于他们时不时会转向保守并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因此很少有人能明白国内问题往往能在千里之外发生的一件事中找到根源这一事实。

但是，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重新点燃了美国人对于国外事件的兴趣，尽管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共产主义的垮台及其垮台时的混乱局面，以及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的危机都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而其后美国在索马里、卢旺达及海地的介入等也是如此。

美国人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人口增长正给地球上的土地、水、能源资源及经济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

人口压力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估计，1994 年全球人口约为 56.6 亿，并仍以每年 9400 万人的速度增长着（1950 年时全球人口约为 25 亿）。至 2025 年，全球人口预计将达到 85 亿。由于在预测出生率方面的困难，对于 2050 年时全球人口的估计数字众说纷纭，保守的估计为 78 亿，居中的估计为 100 亿，而最高的估计则为 125 亿。

据人口研究所 1998 年报告，未来 30 年内将至少有 74 个国家，包括尼日利亚、伊朗、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及危地马拉等，它们的人口将翻一番。此外，有 33 个国家，其中 25 个在非洲，仍将保持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六个孩子的水平，而全球将有 30 亿妇女——这一数字相当于 1960 年时的全球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内步入生育期。

托马斯·梅里克（Thomas Merrick）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私人机构——人口指导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主席。他曾经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它们是否要成为永远处于世界经济底层的二等公民的问题。而对于相对发达的国家来说，尽管它们的人口状况正趋于稳定，但在一个由于现代交通和通讯而变小了的世界里，要想在一片贫困的汪洋大海中保住几个富庶的孤岛也是很难的。”一旦人口的不平衡造成大规模的移民潮，这种贫富之间的差别将难以维持。

不过，即使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但由于 20 世纪

末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通常具有国际性，而且并非一个国家单独可以解决，这些特性可以说也正在改变着美国人传统的地方主义。

很多人都相信，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对现有的世界政治格局进行重组。因此，像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这样的国际组织就很重要，尽管它们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与前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合作似乎已使联合国重新焕发光彩，其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几乎一致的谴责以及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制裁。不过，此后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卢旺达、科索沃、伊拉克及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担忧。

前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里绍尔（Edwin Reischauer）认为，要想改变美国人的地方主义，首先要通过对教育进行深层次的重新规划来改变美国大众。在他看来，不断扩散的通讯技术正迅速摧毁着曾在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起着缓冲作用的那些介质，而这反过来不仅提高了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同时也增大了产生磨擦的机会。

里绍尔指出，“就在世界向一个单一的人性化社会，或者像有些人叫它地球村演变的同时，构成世界人口的不同民族与文化群体仍保留了许多也许更适合一个不同的技术时代的观念与习惯”。

他同时说道，在美国，教育“在提供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以及帮助形成有关其他民族的观念方面，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的脚步仍不够快，而这对于今后几代人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与那些吸引了我们大多数人注意力的军备平衡等问题相比，这才是一个更具国际性的问题”。

民意测验表明，众多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几乎一窍不通。举例来说，一项盖洛普调查就显示，一半左右的美国人不知道美国需要依靠进口汽油来满足内需。

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教授在描述目前美国人对于国际问题教育的忽视程度时，用了“令人震惊”这样的字眼，而他也许还要补充说，大多数美国媒体对于国外新闻也过于忽视了。实际上，最令这方面专家担忧的是，美国人对于美国疆土以外的国际事务的无知和冷漠也许会损害美国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影响力。下一代美国人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将无从全身而退。

应该说，国际问题教育和正规教育同等重要，而它在改变人们观念与增进相互理解方面的影响，有时却要等到一两代人之后才能显露出来。短期来说，信息流通与新闻流动在帮助人们了解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危险方面，所起的作用比教育要大。

二战以来，一个复杂的全球新闻媒体网络逐渐发展起来，为国际信息流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存在于快速通讯自身能达到的能力范围和人们对于快速通讯的需求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从两个长时期的历史进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中演变出来的。在这两个进程中，一个是人类社会正在向单一化的地球村方向发展的进

程，而另一个则是人类文明在经历了通话、书写、印刷与电子通讯（电话与广播）四个通讯时代后，目前正在向以电信（主要是人造卫星）和电脑技术为基础的第五个远距离即时通讯时代迈进的进程。

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认为，大众媒体的变革加速了世界历史车轮的前进。一些本应晚些发生的事件提前发生了，而这种时间上的变化也对一些事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 1986 年的下台为新闻媒体影响国际政治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明证。自从反对派领袖贝尼格诺·阿基诺在竞选中被杀害，美国媒体一直对马科斯抱有极大的兴趣。马科斯所谓的“隐藏的财富”，包括他在纽约市内的房地产，以及马科斯本人令人怀疑的战争记录等，成为美国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对象。这种状况实际上帮助了另一位总统候选人科拉松·阿基诺，同时也大大刺激了美国公众与国会。在媒体报道显示马科斯的胜利实为一场骗局之后，里根政权不得不催促马科斯赶紧下台。

正如《时代》周刊的托马斯·格里菲斯（Thomas Griffith）所指出的，“搞垮马科斯并非是丹·拉泽（Dan Rather）或乔治·威尔（George Will），而是美国的电视，是那些画面，那些修女，那些头上缠着黄布条、试图挡住军车的人们，是那些投票箱被当成垃圾一样扔掉的场面。在经历了几个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之后，美国对于马科斯的支持终于不复存在，而这也加速了马科斯的倒

台。电视再一次证明了它令人敬畏的力量”。

沃尔特·里森 (Walter B. Wriston) 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指出, “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过去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全球电子网络正促使我们对主权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信息的快速传递已成为激发变化的根本力量, 同时也促进了政治与经济自由的发展。马科斯的倒台并非一个孤立事件”。与此同时, 1989 年发生在柏林、布拉格等地的事件也为现代通讯所具备的力量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 (详情请阅第五章“西方新闻与大众文化的全球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南非。1985 - 1986 年间, 由于国外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集中的报道, 国际社会对于南非各地的种族冲突以及南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事件作出了更为迅捷的反应。1960 年, 就在南非警方制造了酿成 69 名黑人死亡、180 人受伤的沙佩维尔惨案后不久, 国际社会也曾对南非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南非各地持续的种族冲突、国际舆论的谴责以及资本的撤出等作出过类似反应。但到了 80 年代中期, 随着人们在整晚的电视报道中看到黑人示威者遭白人军警袭击, 国际社会的反应, 包括谴责、抗议、制裁和撤出资本等, 变得更为迅速和激烈。无怪乎南非于 1985 年 11 月宣布, 禁止一切国外电视及新闻摄影记者对南非黑人城镇中的种族冲突进行报道。因此, 尽管暴力冲突仍在继续, 但由于没有图像, 美国电视中的相关报道大为减少, 国际社会对于南非的压力也相应减轻。不过, 国外舆论压力引发的进

行政治改革的动力却并未由此消亡，纳尔逊·曼德拉最终于 1990 年获释出狱，并于 1994 年当选南非总统。

国际舆论 1998 年 5 月间对于印尼局势的关注，可以说也为推翻苏哈托总统的不流血政变助了一臂之力。

也许有人不愿相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尽管人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相形之下，能够真正了解或者说真正关心发生在自己国家以外的世界事务的人却是少得可怜。许多看电视新闻的人对于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比如说尼日利亚取消大选或是印度尼西亚爆发股市危机等，都是只知皮毛。而对于那些真正关心国际大事的人来说（这种人每个国家都有），他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也不断受到发生在远距离即时通讯领域里的这场变革的影响。

人们能否对这场技术革命的成果加以运用，实际上是与人们能否一致地、而且坚定地沿着一个地球村的方向迈进紧密相关的。国际问题专家一直担心，世界上不同的人们能否对其自身加以组织，从而有效地处理被人们称作是当今世界七大相互关联的难题，即贫困、人口、食品、污染、能源、军费开支，以及金融体系问题。不过，要进行组织，首先就要进行交流，因为相互交流构成了任何组织的中枢神经系统。无论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原始部落，还是一个全球性的社区，任何社会的界限都是由其内部进行相互交流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决定的。只有范围更广的、更为有效的相互交流，才会使一个可行的地球村构想成为现实。

要想让这一信息尽人皆知，从技术上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文盲、贫困，以及政治羁绊等种种障碍却使很多人都无从对其进行了解，而其中文盲的状况又最令人忧虑。不过，目前的状况已有改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在 1997 年 9 月 8 日国际扫盲日的报告中说，全球文盲状况正在好转，文盲率已从 50 年前的 45% 下降到今天的 23%。考虑到全球人口在此期间持续增长，这真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不过，这一平均数字却也掩盖了许多惊人的差异。1995 年，全球有 19 个国家的文盲率仍达到 70% 甚至更高，而其中 14 个是非洲国家。此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在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阿拉伯国家中，文盲率也呈上升趋势。

知识是实现现代化、普及教育，以及使用大众传媒的关键要素。由于非洲广大地区尚未脱盲，所以无怪乎整个非洲才只有 125 种日报，而仅仅在美国，日报就有 1770 余种。因此，无论在任何国家，随着可供人们使用的传媒数量的不同，以及人们使用传媒的能力的不同，各个国家中能够及时获知各种新闻与信息的人的比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于生活在日本、西欧或美国这样的“信息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每天可以得到的新闻与信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泛滥成灾，而对于其它众多的贫困国家来说，却只有一小部分人才能够参与到国际信息流通中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因为他们拥有的新闻媒体太

少了。不过，话说回来，无论他们到底生活在哪里，在解决棘手的国际问题方面，能够把握机会获取信息并加以运用的人却又实在是少之又少。

国外新闻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没落

人们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基本的信息都是来自媒体。如果缺少了可靠的新闻与信息流通，我们的经济、社会以及政府在运转时都会遇到困难。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里，如果缺少了独立的新闻媒体，那将是不可想像的。

国外新闻是一类特殊的新闻。长期以来，大多数严谨的记者和编辑一直认为，应该对来自国外的重要信息进行有力地、透彻地报道，即使大多数人更为关心的也许只是发生在其居住的社区或是与其自身直接有关的事。

纵观我们这个动荡的世纪，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很多事件都直接影响或干扰了美国人的生活，比如说一战、全球大萧条、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崛起、二战、朝鲜战争与越战、冷战，以及近期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的全球经济等。在一个开放和民主的社会里，公众需要对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件进行了解，从而对他们的政府在应对外部威胁时的能力进行判断。美国新闻史清楚地表明，最好的、最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总是一贯对国外新闻给予极高的重视。这种情况在今天也是如此，特别是对那些为数不多的有远见的报纸而言。

但是在今天，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国外新闻看起来确实显得没有在冷战结束前或核威胁消失前那么重要。我们究竟应该怪谁呢？是媒体，还是老百姓？也许两者都有责任。无论是苏丹的饥荒和内战，还是发生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内部争斗与种族灭绝，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又发生了涉及美国士兵或人质的情况，每天的报纸上平均只有六条与国外新闻有关的短讯。

大多数美国人都是通过看电视来获知新闻，但常看有线电视新闻的人却已发现，除非有暴力镜头（50%的电视国际报道都有暴力镜头），电视上的国外新闻已被压缩到只有几条短讯（通常都是以“下面来看国际方面”开头）。批评人士指出，那些将严肃的国外新闻挤到一旁的，是更为个性化的、能够对观众自身起到帮助和借鉴作用的新闻，也就是所谓的“自助新闻”。

不过，公众对此却并不在意。普氏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996 年对美国公众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经常关注新闻媒体的人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依次是犯罪、有关当地人物与事件的新闻，以及有关健康的消息。国际新闻排在第九，位居体育、当地政府、科学、宗教，以及政治新闻之后。

美联社是大多数美国新闻媒体获取国外新闻的主要渠道。由美联社组织的有 700 名编辑参与的年度评选结果显示，在 1997 年全美十大新闻中，没有一条是严肃的国际新闻，除了有两条分别是戴安娜王妃之死（第一

名)与特里莎修女之死(第三名)。

大多数国外新闻都包含能突出反映当地政策问题的政治与经济事件。自 70 年代末以来,除了 1989 年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的时候,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一直呈稳步下降的趋势。加州州立大学的迈克尔·埃默里(Michael Emery) 1989 年时就曾指出,在当时出版的十家大报的所有未刊登广告的版面上,只有 2.6% 的部分用于进行国际报道(详情请参阅第八章“海外报道的变迁”)。

普氏研究中心 1997 年进行的其它调查表明,关注国外新闻的人口比例已从 80 年代的 80% 下降到 90 年代的 20%。这一下降在青年人中最为明显,因为很多青年人一看到某些传统的标题,例如国际政治、安全、战争或和平等,马上就会掉头而去。能吸引美国成年人的严肃新闻的数量相对较少,其中大都与全国性的灾难以及美军部队的投入使用有关。平均起来,每四个美国人中只有一个(25%)才会真正关注日常的新闻报道。一项对五年中报道过的 480 条新闻进行的调查显示,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都被一些自然或人为的灾难,比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以及涉及美国公民的战争和恐怖事件所吸引。最为明显的是,1991 年时只有 5% 的美国人真正关注有关南斯拉夫爆发内战的消息。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斯蒂芬·赫斯(Stephen Hess)认为,美国正在成为一个具有双媒体系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国外新闻方面。我很同意他的观点。赫斯写到:“我

们的社会正浸淫于专业化的信息（包括国外新闻）之中，而这种信息的受众大多是那些拥有足够的时间、兴趣、金钱以及教育水平，从而能对其加以利用的人。另一个社会中则包括美国人的主体，他们对于那些不用他们必须考虑的事情（再一次包括了国外新闻）通常只给予极少的注意。他们满足于通过观看有线电视晚间新闻的头条，以及阅读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报纸来获取信息。”

不过，这种对于国际问题的不感兴趣也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令人沮丧。近期的民意测验显示，就在公众把一些国外新闻拒之门外的同时，他们也确实希望能够介入一些全球性的危机，只不过和政府、学术机构，以及媒体倡导的方式不同罢了。举例来说，马里兰大学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4% 的美国人希望能够对权力进行国际分享，而与此同时，只有 13% 的人希望美国能维护其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同样，就在国会拒绝向联合国支付 15 亿美元的逾期欠款时，普氏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联合国的地位不容忽视。普氏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还表明，通过国际合作来制止全球变暖的现象得到人们非常广泛的支持，即使调整燃料消耗水平也许意味着美国人在购买汽油时需要掏更多的钱。

简言之，公众看起来总是非常关心他们认为会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可能会影响他们工作与纳税的外来移民与贸易谈判问题、资源枯竭之类的环境问题，以及对于健康的威胁、毒品贸易和其它跨国

犯罪问题。

一致行动还是分道扬镳？

无论是海洋污染还是核武器扩散的问题，事实都是国际社会始终处于一种缺少集体行动、竞争多于合作，以及缺乏为一个共同目标进行奋斗的状态，换言之，也就是始终处于一种近乎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整个世界由不同的民族国家进行分治，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能对世界进行有效的管理，而这些国家通常又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开展行动。在好几个非洲国家，一个更为令人沮丧的趋势已然出现，即在缺少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的情况下，整个国家都已分裂为互相交战的不同群体。对此，政治学者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Tucker）指出：

“今天看来，一个即将出现的地球村的前景不可能十分美好。在这个地球村将如何形成的问题上，我们不仅无法看到一种统一的认知；相反，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我们看到的却是互不联系、彼此不同的认知。尽管国际社会对此曾一度有过共识，但形成一个能推动人们为共同的美好目标做出奉献的人人共享的社会，其前景目前看起来最多还只处于襁褓状态。如今，由于核武器、贫困，以及人口增长等问题引发的全球性挑战——这里提及的还只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还只能在一个在很多方

面和以往同样分化的世界中加以解决。”

一些学者指出，过于明显的一味追求全球一体化实际上反而令人有些迷惑。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者史蒂文·克莱斯纳（Steven Krasner）认为，宣扬世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观点缺乏历史依据。他指出，思想、贸易，以及资本的全球流通实际上已经进行四百到五百年了。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有被夸大之嫌，我们目前甚至还没有达到十九世纪末时的一体化水平。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不过是又回到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的过去的一条老路上。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世界趋同以及趋于不同的进程正在同时进行。1993年，《纽约时报》列出了全球48个长期以来被压制的种族和宗教，以及地区冲突最终爆发出来的国家。政策制订者们认为，这实际上已是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种族冲突浪潮。前两次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一战之后，而第二次则发生在二战后非洲与亚洲爆发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之时。这些国家大多数历史已久的冲突以及无法化解的矛盾并未受到通讯技术变革的影响。

另一方面，强有力的技术与电子手段却使世界渐渐融为一体，各种新闻、观点和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在这些技术手段的帮助下，众多经济实体正逐渐转变为真正的国际化企业。

因此，尽管全球一体化看起来既真实又容易使人迷惑，但从科幻小说作家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